

漫談紅山文化玉材產地與

岫岩玉礦的早期開發

／郭大順

隨著紅山文化玉器的不斷出土，對這批玉器的玉料產地越來越引起關注，並且逐漸成了一個專門研究課題。期間認識雖有所反覆，但已取得重要進展。

一

所說的認識有所反覆，主要指紅山文化玉材產地與岫岩玉礦的關係。二十多年來，對其間的關係即紅山玉是否來自岫岩玉，經過了由推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傾向於肯定，可以說是認識的三階段：

八〇年代中期紅山文化玉器剛剛被確認後，關心紅山文化玉材產地的學者，自然多與鄰近的遼寧東部山區岫岩玉相聯繫，以為來自東部的岫岩一帶。更有由此引伸：岫岩玉為蛇紋岩質，而根據地質界對玉的界定，蛇紋岩非玉質，而為石質，故紅山文化玉器從嚴格意義

上講，不屬玉類，而屬石類，稱「似玉」（註一）。

九〇年代初，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中國地質部地質研究所聞廣對紅山文化玉器作了取樣鑒定。選取標本四十九件，其中牛河梁遺址四十件，東山嘴遺址一件，胡頭溝遺址二件，遼寧省博物館和旅順博物館藏紅山文化玉器標本五件。結果是，除個別為葉蛇紋岩或方解石、天河石、滑石等以外，有三十一件為透閃石軟玉，占到百分之六十三（註二）。由此，紅山文化玉材來源於岫岩玉的觀點產生分化，有的學者以此鑒定結果為依據，提出紅山文化玉材並非來自以蛇紋岩礦為主的岫岩玉，而可能另有來源，並具體指出岫岩縣以東的寬甸縣有色澤與紅山文化玉器類似的透閃石軟玉礦。但仍有學者堅持岫岩說，因為岫岩有老玉礦，早年作過鑒定，有透閃石軟玉。

最近幾年，北京大學王時麒等地質學者，對岫岩玉礦作了進一步調查、取樣分析和比較，其結果是，不僅岫岩的老玉礦即被稱為細玉溝的礦脈確藏有透閃石軟玉，而且以蛇紋岩為主的礦體中也有含透閃石軟玉（註三）。這樣，紅山文化玉材可能來自岫岩玉礦，又提上日程。同時，由於屬於岫玉系統的玉礦除遼東地區以外，在新疆昆仑山等共三十多個地點都有分佈，因此，需要對不同地域屬於岫玉系統的玉礦特性即「產地特徵」，制定區分標準，對此，也在摸索新的檢測手段，這就為紅山文化玉器與不同地區的岫岩玉，在成份等方面的

微觀比較提供了條件（註四）。

不過，史前玉器原料的來源和產地的確認，是史前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提出的問題是：岫岩所在遼東山地不屬於紅山文化分佈區，遼東地區尚無紅山文化遺跡發現，而由岫岩玉礦生成地帶到紅山文化分佈中心區，直線距離雖僅四百餘公里，但其間隔千山山地、遼河、醫無閭山、大凌河與遼西丘陵，它們分屬於遼西和遼東兩個文化區。所以，需對兩地史前時期歷史文化關係作進一步調查研究，這是最終確認紅山玉與岫岩玉礦之間關係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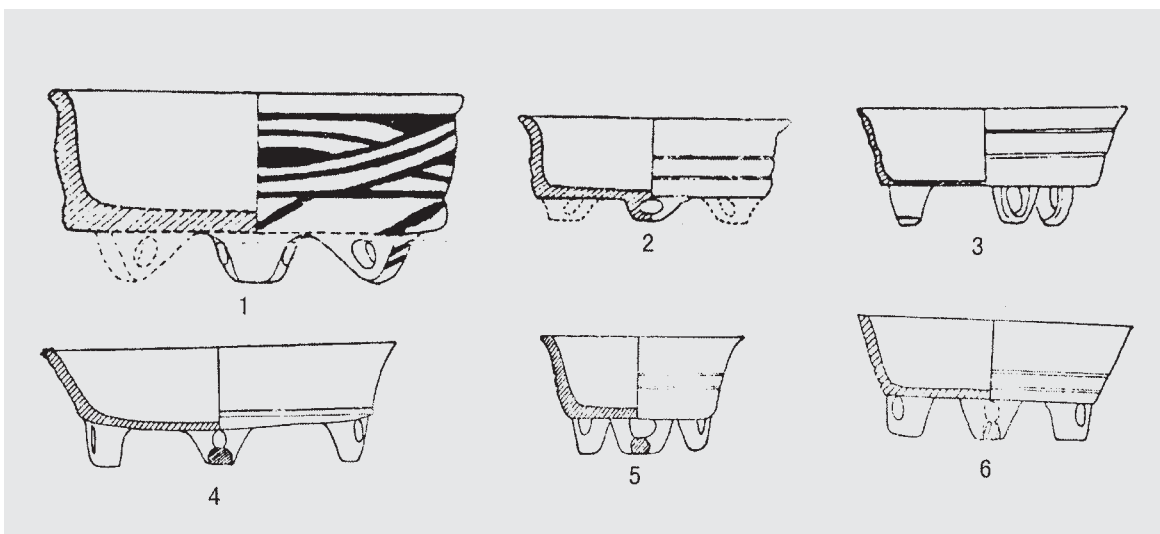
目前有關史前時期遼西地區與遼東山區文化關係的考古線索有：

紅山文化與岫岩玉礦生成地帶所在的遼東山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都以裝飾一種壓印紋的筒形陶罐為主要特徵，這類筒形陶罐是東北文化區新石器文化共有的考古文化特徵，所以，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區與岫岩玉礦所在的遼東區，應同屬於一個大的文化區系（圖一）。

反映遼西與遼東文化關係的又一考古實證是，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阿魯科爾沁旗，曾出土過一件彩陶三環足盤，為紅地黑彩，彩陶圖案近於紅山文化常見的勾連紋帶。三環足盤是山東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陶器，也見於遼東半島受山東龍山文化影響的小珠山上層文化，岫岩玉礦所在的岫岩縣城西北郊的北溝西山遺址，也出有這類三環足器（圖二）。它們的時代都



圖一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附近的後窪遺址出土壓印席字紋筒形陶罐，見徐秉琨、孫守道主編《東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農牧文明》第29頁圖版18，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圖二 三足盤比較圖 (1·阿魯科爾沁旗, 2·小珠山遺址上層, 3·三里河遺址, 4、5、6·岫岩北溝遺址)

要晚于紅山文化。三環足盤在遼西地區出現，並飾有具紅山文化特徵的彩繪圖案，應是紅山文化後裔直接或間接受到山東龍山文化影響的反映，而遼東半島的小珠山文化等，則很可能是這一影響的一個直接源頭，所以，遼西地區出土的這件彩陶三環足盤，應是包括岫岩玉礦所在地的遼東地區新石器文化與遼西紅山文化聯繫的一個重要證據（註五）。

與此有關的是，在紅山文化之後的小河沿文化時期，山東半島新石器文化加強了與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聯繫，集中表現為小河沿文化所出大量鏤孔豆、高足杯、壺等都有接受山東大汶口文化影響的現象（註六），而遼東山地應在這一交流通道上。

此外，鞍山市博物館藏有海城小孤山洞穴附近採集到的一件石（玉？）耜，形制特徵近于紅山文化石耜，也是其間關係的又一重要線索（註七）。

二

以上所列有關考古現象，雖還缺乏紅山文化與遼東山區新石器文化之間關係的直接證據，其中阿魯科爾沁旗彩陶三環足器和小河沿文化所反映的遼西與遼東地區文化關係，都是紅山文化之後才出現的。但理清史前時期遼西地區與遼東山區的這種歷史文化關係，對最終解決紅山文化玉材產地與遼東山區岫岩玉礦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四○○○年）、丹東市東溝縣石佛山類型（距今四○○○年以後）。

遼東半島南端和海島區。有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約七○○○~六○○○年）、小珠山中層文化（距今約五五○○~五○○○年）、小珠山上層文化（距今四五○○~四○○○年）。它們分別以大連市長海縣廣鹿島小珠山遺址的下、中、上層遺存為代表。

從壓印紋筒形罐的造型，施「之」字和席字紋、圖案佈局、特點以及由壓印紋陶向刻劃紋陶演變的趨勢看，遼東半島南端和海島區與黃海沿岸區更為接近。不同的是，因遼東半島南端和海島區更為靠近山東半島，所以，遼東半島南端與膠東半島古文化的關係，較黃海沿岸為密切。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所在的遼東山地，其東南一側，具有面向黃海的河川地理形勢，所見史前陶器有具後窪下層文化和後窪上層文化特點的標本，應屬黃海沿岸區。而其西北一側，從海城小孤山洞穴新石器時代文化層所見壓印之字紋陶器看，與遼河平原區較為接近，似具有介於遼河平原和黃海沿岸之間的特徵。

還要提到的是，偏堡文化雖最早發現于遼河平原區的新民縣境內，但在遼東半島南端和與黃海沿岸區緊鄰的朝鮮半島北部也有發現，且有的時代較早，如普蘭店市三堂遺址。所以，岫岩所在遼東山地又在偏堡文化的分佈區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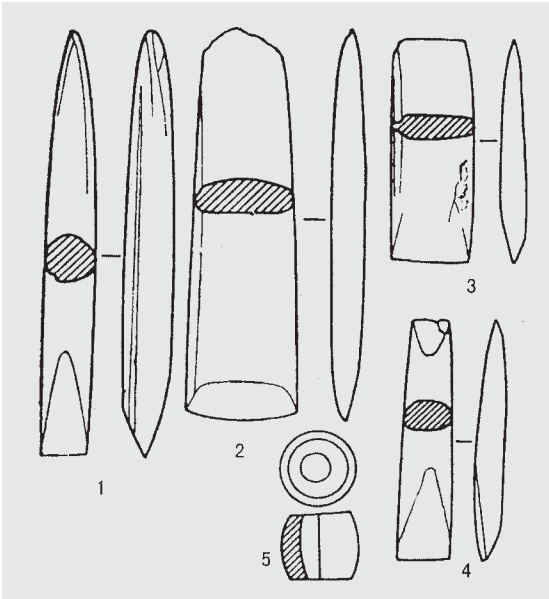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曾發現過舊石器時代晚

就在紅山文化玉器確認前後，在紅山文化分佈範圍內外的東北其他地區，又陸續有史前玉器被發現或重新引起重視。其分佈情況，如以岫岩玉礦生成地帶為中心，由近及遠，可以分為遼東地區和包括遼西在內的東北其他地區兩部分。因為岫岩玉生成地帶屬遼東山地，故以遼東地區史前文化及出土玉器與岫岩玉礦的關係最為密切，是探索岫岩玉礦早期開發史最直接的資料，所以有必要對遼東地區史前考古文化及發現玉器詳加論述。周曉晶曾對遼東半島新石器時代玉器作過初步研究，並與岫岩玉相聯繫（註八）。這裏從有關材料到歷史文化關係等方面，對遼東地區史前文化及玉器的發現情況，再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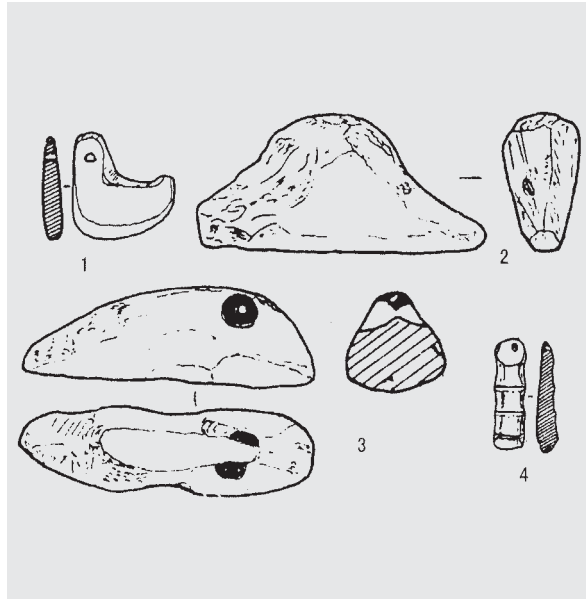
前述包括遼西和遼東地區在內的東北地區新石器文化都以一種飾壓印「之」字形紋的筒形陶罐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遼東地區的史前文化，這種壓印之字紋筒形罐都特別發達，而且有由壓印紋筒形罐向刻劃紋筒形罐演變的共同規律。又可依地理形勢和各自特點分為三個小區：

遼河平原區。有新樂文化（以瀋陽市北郊的新樂遺址下層遺存為代表，距今約七○○○~六○○○年）和偏堡文化（以瀋陽市新民縣偏堡遺址為代表，距今約五○○○~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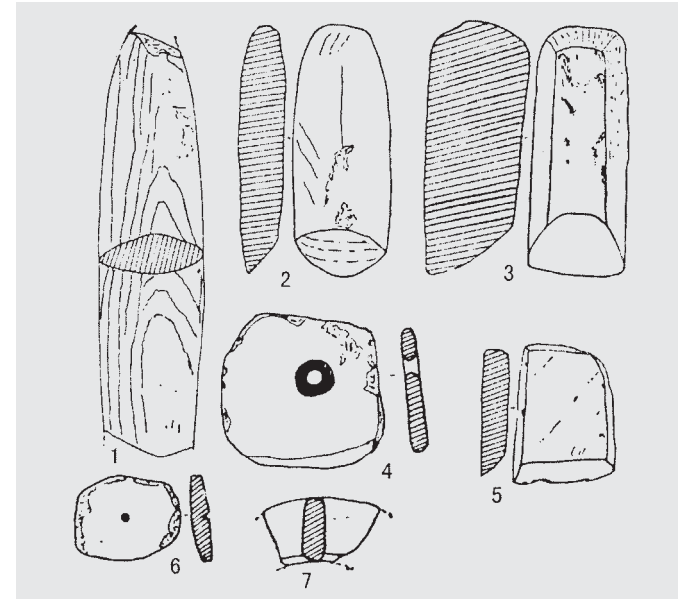
黃海沿岸區。有後窪下層文化和後窪上層文化（以丹東市東溝縣後窪遺址的下、上層遺存為代表，分別距今約六○○○年和五○○○年前）、岫岩縣北溝西山類型（距今約四五○



圖五 新樂遺址第二號房址出土玉器（1·圓鑿式雕刻器，2·斧式雕刻器，3·雙刃斧式雕刻器，4·雙刃鑿式雕刻器，5·黑玉珠）



圖四 後窪遺址出土玉器（1·玉鳥形墜飾，2·類鳥首形玉件，3·玉魚形飾，4·玉竹節形墜飾，1、4·下層，2、3·上層）



圖三 岫岩北溝遺址出土玉器（1·岫玉劍，2·蛇紋岩玉鑿，3·蛇紋岩玉鏃，4·蛇紋岩有孔飾件，5·岫玉鑿，6·蛇紋岩玉片—石芯廢材，7·環）

期的海城小孤山洞穴遺址。繼小孤山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之後，在距今約六〇〇〇~四〇〇〇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也一直有古人活動，且與遼東其他地區有密切聯繫。從而具有更多共性。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所出史前玉器，目前只

遼東地區各小區各階段諸史前文化，大都

有包括玉工具在內的玉器發現。依考古發掘簡

報描述，可分為岫玉、蛇紋岩玉和未經質地鑑

定的玉器。它們又可依岫岩玉礦生成地帶為中

心分為幾種情況：

有一處遺址有明確發現，即岫岩縣城西北營子村壩牆裏屯北溝西山遺址。據簡報介紹，該遺址出有蛇紋岩質玉器十一件：鏃二件、鑿三件、環一件、有孔飾二件、有孔墜一件、玉片二件；岫玉玉器二件：劍和鑿各一件（圖三）。共十三件（註九）。日本學者岡村秀典以為，北溝西山遺址「出土有磨擦痕跡岫岩玉廢材和管鑽穿孔岫岩玉廢材芯。芯廢材是一面穿孔，由內徑不同的二種管狀工具穿孔，側面形成了雙層」（見註二五）。岡村先生所研究的標本，應指其中的蛇紋岩質石片，從發表的一件石片圖上看，剖面有臺面，有可能是管鑽所遺玉芯，但平面非圓形。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周邊所出史前玉器，主要為後窪遺址下、上層所出玉器，據簡報計有：後窪遺址下層所出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四十二件：玉鑿三十二件、玉錐五件、玉墜三件、玉竹節狀墜飾一件、玉鳥形墜飾一件；後窪遺址上層所出蛇紋岩質玉環二件，未描述玉器三十件：鑿二十八件、類鳥首形玉件一件、玉魚形飾一件（圖四）。共三十二件。另，遼東山地深處的本溪縣馬城子B洞下層遺存近於後窪下、上層文化，該遺存出有玉斧一件、玉刻刀一件（註十）。

岫岩玉礦生成地帶鄰近地區所見史前玉器。主要為遼河平原區新樂遺址和遼東半島南端及海島區所出玉器（圖五、六、七）。

新樂遺址（下層）所見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計有斧式雕刻器、圓鑿式雕刻器、雙刃斧

式雕刻器、雙刃鑿式雕刻器各一件，黑玉珠一件，共五件（註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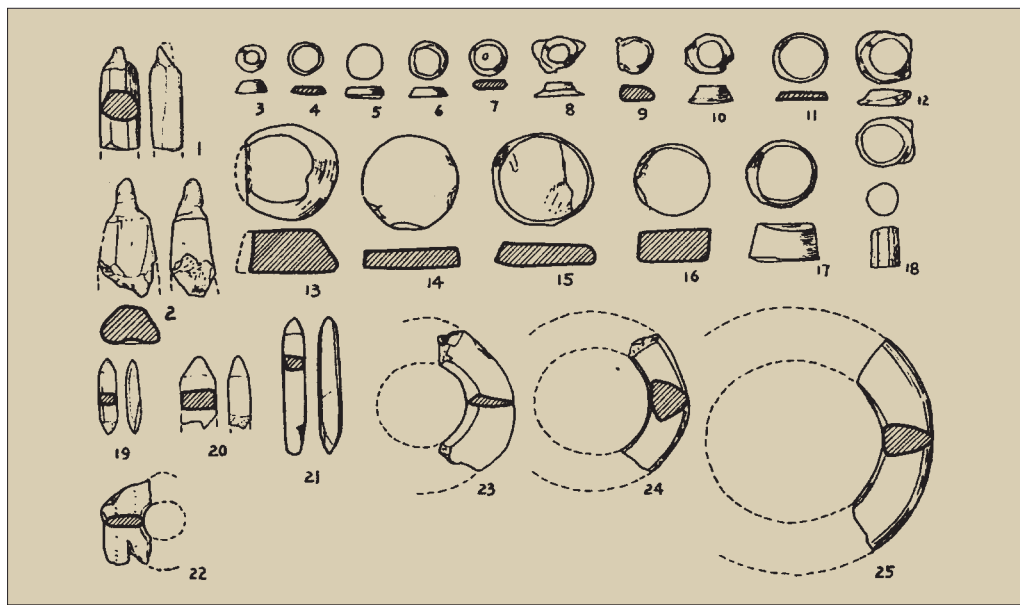
遼東半島南端和海島區所出玉器計有：

小珠山下層文化。有小珠山遺址下層所出岫玉質斧一件；北吳屯遺址下層岫岩玉五件：斧一件、鏃二件、鑿二件，共六件（註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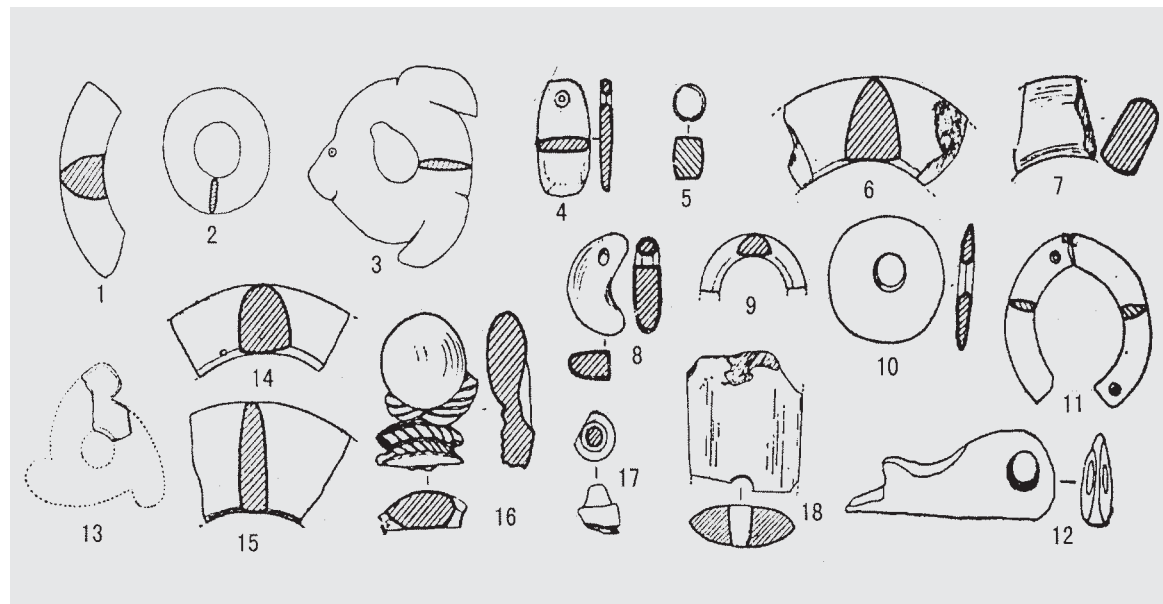
小珠山中層文化出土玉器較多，有小珠山遺址中層岫玉質鏃一件、蛇紋岩質小石球一件；吳家村遺址白色蛇紋岩質環一件，未經質



圖六 新樂遺址第二號房址出土玉鑿，《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遼寧紅山文化壇廟塚》第116頁右上圖，文物出版社/（台）光復書局，1994年。



圖八-1 文家屯採集玉石器：1·岫岩玉鑽，2·砂岩石鑽，3-18·管鑽玉石芯，19-21·錐形玉，22·玉石牙壁殘段，23-25·玉石環殘段。



圖七 遼東半島南端史前玉器（1·白色蛇紋岩質環，2·玉環，3·玉牙壁，4·蛇紋岩有孔墜飾，5·蛇紋岩玉墜，6、7·蛇紋岩玉環，8·勾形玉飾，9·蛇紋岩玉指環，10·蛇紋岩玉璧，11·蛇紋岩玉璜，12·玉鳥形飾，13·玉牙壁殘件，14、15·蛇紋岩玉環，16·玉簪，17·蛇紋岩玉鑽，18·蛇紋岩玉矛，1-3吳家村遺址，4-11，郭家村遺址下層，12·北吳屯遺址上層，13·三堂遺址下層，14-17·郭家村遺址上層，18·蠟磳崗）

遺址玉斧一件，蠟磳崗遺址玉斧一件，廟山遺址蛇紋岩玉斧一件，大崗遺址蛇紋岩鑿二件，

臭梨隈子遺址玉石墜一件，共七件（註十六）。

以上所列遼東地區發現的史前玉器，僅為考古簡報所具體確指的玉器。共計一七九件，其中描述為蛇紋岩質的三十三件，岫玉的二十三件，未描述玉質的玉器一二三件。

需要指出的是，遼東地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是七〇年代以來才開展起來的，至今已發掘的遺址甚少，而每處遺址的發掘面積也較少，且都為遺址的地層所出，尚無墓葬發現品，雖然如此，出土玉器的數量卻相對較多，特別是幾個只作過地面調查和小範圍試掘的遺址，也大多有玉器發現，說明遼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玉器發現率、從而使用率是相當高的。這些玉器雖多工具類，也有非工具類。有的造型和製作還較為複雜，如郭家村遺址上層所出玉簪，據簡報描述「柄為圓形，平背，鼓面，柄下雕出半環狀帶，兩端各有一對鑽孔。」這些都充分說明，遼東史前人類都是喜用玉器的部族。由於這些部族就活動在岫岩玉礦生成地帶，他們直接接觸不同生成條件的岫岩玉礦，從而產生對玉的特殊鍾愛的傳統而就地取材就更為可能。在岫岩北溝和文家屯都發現了用管鑽法鑽孔所遺玉芯，文家屯遺址還採集到玉鑽頭，郭家村遺址採集有殘留擦切痕跡的岫岩玉廢材，四平山積石塚更有以玉原石隨葬（註十七），這些又都是古人在當地採集以至製作玉石的明證。不過，遼東諸史前文化用玉量雖有一定數量，但一般為小件玉器，尚無大件玉器

地鑑定的玉器五件：鏘二件、鑿一件、牙壁一件、環一件；郭家村遺址下層蛇紋岩質玉器八件：珠一件、有孔墜一件、無孔墜一件、環二件、指環一件、璜一件、璧形飾一件，岫玉質斧一件，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一件，為勾形玉飾；北吳屯遺址上層蛇紋岩玉二件：斧一件、鑿一件，岫岩玉七件，皆為鏘，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三件：鑿二件、玉鳥一件；營城子文家屯遺址岫玉小環一件（註十三）。

偏堡文化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一件，為三堂遺址下層所出牙壁殘件（註十四）。

小珠山上層文化蠟磳崗遺址蛇紋岩玉二件：矛一件、環一件；郭家村遺址上層蛇紋岩玉六件：盤狀器一件、紡輪一件、鑽（簡報為墜）一件、環三件，岫玉二件：鏘一件、鑿一件，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三件：小玉鏘一件、玉簪一件；營城子四平山積石塚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十一件：玉牙壁九件，殘留有切割痕的玉材邊角料二件（四平山積石塚向出有環、雕刻形器、指環、斧、鏘、玉原石等，但數量不清，未統計在內）。營城子文家屯遺址採集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約十件（另有管鑽玉石芯十餘件，有關文章未具體說明玉芯數量，也不能統計在內）（圖八）。共七十一件。營城子東大山積石塚岫岩玉三件：牙壁一件、鏘二件，未經質地鑑定的玉器三件：玉小環二件、玉飾片一件（註十五）。

此外，在黃海沿線的丹東市東溝縣調查採集有史前玉器：閻坨子遺址玉鑿一件，趙坨子



圖九-2 查海-興隆窪文化 玉匕形器，見《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遼寧紅山文化壇廟塚》，文物出版社/（台）光復書局，1994年。



圖九-3 查海-興隆窪文化 玉玦，見《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遼寧紅山文化壇廟塚》，文物出版社/（台）光復書局，1994年。



圖八-2 文家屯出土玉器：見《文家屯-1942年遼東先史遺跡發掘調查報告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室遼東先史遺跡發掘報告書刊行會，（日）真陽社，2002年。



圖九-1 查海-興隆窪文化 鏃與匕形器，見鄧聰編《東亞玉器》III，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

發現，而且發現的遺址點較多，具體到每一個地點所發現的玉器的數量相對較少，尚無規模較大的成群玉器發現。總的看，遼東地區史前文化用玉量不大，故有推測，當時從附近採集岫岩玉礦生成地帶的河磨玉或俗稱「山流水」的可能性更大。同時，以上所引考古報告的描述，應該都是對實物的表面觀察，未作取樣分

析，而取樣鑒定結果則以透閃石軟玉為主，也進一步證明採集河磨玉的可能性（註十八）。總之，對這些標本、特別是岫岩玉礦所在和緊鄰地區的玉器標本作進一步鑒定（當然理想的是無損鑒定），將對認識岫岩玉礦早期開發史提供一批更直接的第一手資料。

遼東地區以外包括遼西地區在內的東北地區史前文化，是史前玉器發現較多、分佈較廣、出現時代較早也延續較長的一個地區，由於它們與岫岩玉礦生成地帶同屬於東北文化區，這些遺址玉器材料來源與岫岩玉礦的關係，除紅山文化玉器已如前述以外，也都值得注意。它們的發現情況，依時代、地域和考古文化，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先紅山文化玉器，指查海、興隆窪文化發現的玉器。除在遺址的地層有所發現以外，在查海遺址和興隆窪遺址的房址內常發現有墓葬，墓內隨葬有較為精緻的玉器。種類除玉工具斧、鏃、鏝以外，以玉玦為主，同出常有玉七形器（圖九）。據報導，在屬於查海、興隆窪文化晚期的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還有形制較為複雜的玉器出土。新近又有興隆窪遺址出土玉器的報導，這處遺址在興隆窪遺址的東北部約三〇公里，墓中有玉器隨葬的現象較興隆窪遺址為普遍，可知，該文化用玉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註十九）。查海玉器經取樣鑒定，全為透閃石軟玉。

紅山文化分佈區內與紅山文化同時存在的其他考古文化也已有玉器露頭，主要為趙寶溝文化和富河文化。

屬於趙寶溝文化的翁牛特旗小善德遺址出有玉玦（註二十）。另有以為，紅山文化代表裝飾的題材，如小山遺址、南台地遺址和趙寶溝遺址均有刻劃鹿紋的陶尊。而「C」字形龍的形象，原以三星特拉大玉龍的首部特徵為準，以為是以豬為原形的，以後確認的幾件「C」字形龍，其首部形象，如上翹的嘴部、圓而非截平的唇部以及首部以上似角的片狀附飾，其特徵更似于鹿，與趙寶溝文化常見的陶器上的經過神化的鹿形象尤為接近。為此，有以為原屬紅山文化的「C」字形龍，可能與趙寶溝文化有關（註二一）。如是，則趙寶溝文化也應有相當發達的玉器。

富河文化主要分佈於西拉木倫河以北。作為該文化命名地的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並未有玉器發現，但在其以西的克什克騰旗好魯庫農場曾出一批包括玉質工具和玉環、玦等種類的玉器。這處遺址同時出有飾壓印之字形紋的夾砂陶片和製作精緻的細石器，都具富河文化特徵，地點也在西拉木倫河以北，可能與富河文化有關（註二二）。

在紅山文化分佈區以東的廣大東北地區，近年有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玉器。除前述遼東地區史前玉器以外，吉林與黑龍江廣大地區的史前文化中，不斷有玉器發現，已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數量，也已提出這些玉材產地的問題。

吉黑地區的史前玉器，按考古文化分區，在松嫩平原區，張廣才嶺、小興安嶺西側丘陵平原區，張廣才嶺、小興安嶺以東山地及丘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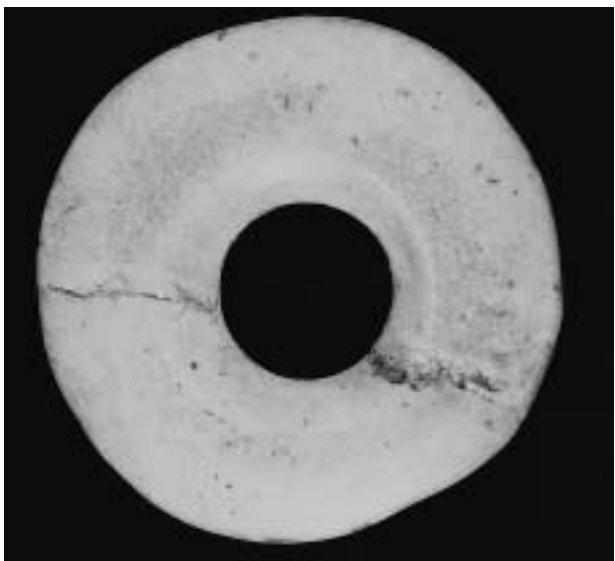
性玉器的「C」字形龍，在紅山文化墓葬內並未正式發掘的紀錄，而已知有出土地點的二件「C」字形龍，即三星特拉大玉龍和廣德公玉龍，附近都有趙寶溝文化遺址分佈，特別是在趙寶溝文化遺址中，多有以鹿形象作為陶器

平原區和三江平原區都有發現。分佈地域相當廣闊，直達三江平原烏蘇里江邊的饒河小南山。據孫長慶等統計，黑龍江省新石器時代玉器出土地點已達二十六處，出土玉器一〇五件。其中松嫩平原區十三個地點，三十八件（吉林省出有玉器的四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屬松嫩平原區，共九件，如包括在內，則松嫩平原區共十七個地點，出土玉器四十七件）；張廣才嶺、小興安嶺西側丘陵平原區四處，三十二件；小興安嶺以東山地及丘陵平原區和三江平原區九處，三十七件（註二三）。此後報導的小南山一地出土玉器就達六十七件（註二四）。這些玉器的種類與遼東地區相近，都多為工具類，但也有較多非工具類的環、璧、七形器等，其中玉璧數量最多，達三十九件，占到百分之三七·一。尤其是還發現了與紅山文化玉器有共同特徵、形制較為複雜的二聯璧和三聯璧。黑龍江省尚志市亞布力遺址出土的三聯玉璧，長達九·五公分，形制酷似阜新胡頭溝墓地的三聯玉璧，形體則更大（圖一〇）。至於雙聯玉璧，除通榆張家儉子遺址以外，在齊齊哈爾市杜爾伯特拉哈鎮、泰來縣東翁根山都有發現，實例已超過紅山文化。此外，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發現和報導的依蘭倭肯哈達洞穴墓地曾出有多件玉器，種類有環、璧、璜等，都是非工具類，且有明確出土關係。可知，吉黑地區的史前玉器，不僅數量也已有了相當的積累，而且種類較多，有的還是成組出土。



圖一〇 亞布力遺址出土三聯玉璧和雙聯玉璧，見鄧聰編《東亞玉器》III圖版10、11，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

不過，由於吉黑地區史前文化遺址大都堆積薄，玉器又多採集品，所以，它們的具體年代不宜確指。一般以為，吉林、黑龍江省出土的這批玉器，特徵多近于紅山文化，故其年代也應與遼西紅山文化相接近或稍晚，即在距今五〇〇〇年左右。當然這種相近的特徵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去理解，那就是由於遼西地區紅山文化與東北其他地區新石器文化屬同一個大的文化區系，它們之間在玉器上的共同特徵，有的可能是受到紅山文化玉器的影響，有的則可視為同一文化區系中的共同時代和地域性特



圖一一 小南山M1出土玉器，見《考古》1996年第2期圖版壹、圖版貳之1、2，又見鄧聰編《東亞玉器》III圖版9，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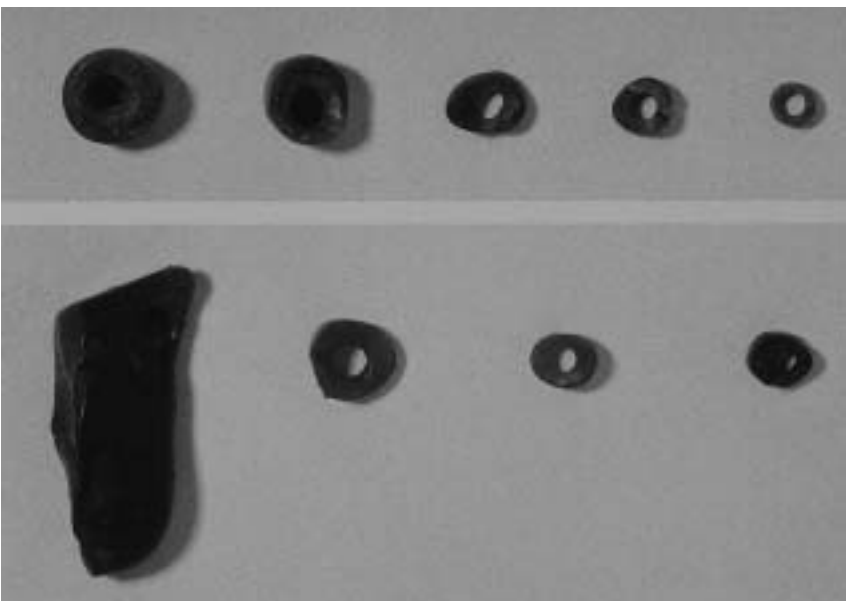
徵。在這方面，值得提到的是，在吉林、黑龍江地區以及相鄰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日本列島，都發現了早于紅山文化時期的玉器，有的可能已相當於查海—興隆窪文化時期，其中小南山等地所出玉玦和玉匕形器的組合，與遼西地區查海—興隆窪文化的玉器在形制和組合上相近或相同，可能說明吉黑地區史前玉器中，有的時代可能較早，有的可能就與紅山文化玉器的前身有關（圖一一）。東北亞地區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日本本州地區所出玉玦或玉匕與玉匕形器的組合，時代都在距今六〇〇〇年前，有的如日本北海道等地，還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玉器，也進一步證明了吉黑地區史前玉器有的時代可能較早（圖一二）（註二五）。

以上地區所發現的史前玉器，雖然數量、種類及由此反映的發達程度，遠不能與紅山文化玉器相比，但時代在提早，分佈地域在擴大，這些玉器產地也已是提到日程的課題。就發現較多的查海—興隆窪文化玉器而言，查海玉器經取樣鑒定的八件標本雖都屬透閃石軟玉，但其色澤偏灰白，與紅山文化玉多偏黃有所不同。其他諸文化是否也各有差別，需逐件觀察分析，尤其是分佈地域十分廣大，其產地也不能是單一的。不過，由於東北地區尚缺少早期玉礦開發的記錄，所以，它們與岫岩玉礦的關係仍然值得注意。黑龍江省同行們以為，由於迄今黑龍江乃至吉林省尚未發現類似的古玉產地，而新石器時代的黑龍江，與內地山川

相隔，所以推測這些玉器的原料也應來自遼寧岫岩、寬甸一帶，屬於岫玉系統，而不可能取自更遠的產地（註二六）。

四

東北地區史前時代普遍有玉器發現，已引



圖一二 日本美利河1出土玉珠和珠墜，見鄧聰編《東亞玉器》III圖版2，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

起廣泛重視，並作為東北文化區的一項重要文化因素。這不僅引起了對東北史前文化的進一步關注，而且也推動了包括玉產地在內的史前玉器區系研究的開展。

就在紅山文化玉器公佈不久，它的總體風格與東南沿海另一個史前玉器中心的良渚文化玉器之間的明顯差異就引起學界的極大興趣。黃宣佩將中國史前玉器分為南北兩大區，以為紅山文化為史前玉器分佈的北區，良渚文化為史前玉器分佈的南區（註二七）；鄧淑蘋則將中國史前玉器分為三區，以為以紅山文化為主的北區應擴大為東區，包括了紅山文化和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在東南區則為良渚文化，在這兩個區之外還應有一個以黃河中上游為主的「華西區」，而史前玉器的三大區與依據古史傳說將史前部落劃分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有相互吻合之處（圖一三）（註二八）。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在劃分史前玉器的三大區時，已與文獻記載中的玉產地相聯繫。鄧淑蘋以為，史前玉器的三大區，不僅與古史傳說的三集團相吻合，而且各以文獻記載中的三個玉產地為源頭，這就是《尚書·顧命》所記的大玉、夷玉與越玉。並將紅山文化及查海—興隆窪文化及玉器所出的遼西、內蒙古地區，與山東半島一併劃歸「夷玉」區。楊伯達從不同區域玉材的礦物學比較與文獻記載相印證，提出東北地區的「珣玕琪」、東南地區的「璠琨」及其分支和西北地區的「球琳」這三大玉板塊和玉品種（註二九）。



圖一三 玉器分區與古史傳說三大集團對應圖，見《中華文物學會》1995年年刊第45頁。



圖一五 東北地區考古學遺址分布圖



圖一四 三大區劃分及其交疊示意圖

陶器在辨別考古文化中的尺規地位，玉器的區域劃分應以考古文化區系劃分為基礎，故山東半島玉器應與東南沿海地區玉器劃為一區，這從山東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玉器與東南沿海良渚文化玉器具有更多共同性也可以得到證明。而山東半島玉器表現出的與東北玉器、特別是紅山文化玉器和遼東半島玉器的共同點，則應理解為區間文化交流的反映。

對史前玉器及其產地的區域劃分與考古學文化區系劃分相互吻合這一重要歷史文化現象，還可以作更進一步的探求。因為從考古文化上劃分三個大區是在中國文明起源討論中提出的，新的考古發現證明，這三大區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曾起到高於其他地區的作用，這集中表現在距今五〇〇〇年前後的階段。這一

關於與東北史前玉器產地有關的「夷玉」，明確記載見於《尚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爾雅·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玞琪焉。」《說文解字》將這兩處記載結合起來，曰：「醫無閭之珣玞琪，周書所謂夷玉也。」

學界多以為，這裏所指產玉的「醫無閭」，即今遼西與遼東分界之醫無閭山脈，該山脈正為紅山文化分佈東界，故紅山文化玉材源于醫無閭山的可能性較大，但至今醫無閭山及附近地區，尚無有玉礦蘊藏的記錄。楊伯達則明確認為，遼東岫岩玉礦就是「珣玞琪」的一個主要產地。

饒有興味的是，玉學專家們關於史前玉器及其產地的區域劃分，與考古學文化區系劃分，有十分相近之處。

根據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在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史前時期，可以分為三大考古文化區，它們是：以彩陶和尖底瓶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原文化區；以鼎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文化區；以筒形陶罐、細石器和玉器為主要文化內含，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北文化區（註三〇）。這與從玉器和玉產地所劃分的三大區大體吻合，不同之處在於對山東半島的劃分。如上述，有學者將山東半島史前玉器與東北玉器劃歸為一區，即「夷玉」區，而根據考古文化特徵，山東半島是陶鼎主要起源地，與東南沿海其他地區統稱「鼎文化圈」。由於

時期，既是三大區各自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關鍵時期，也是三大區考古文化個性得以充分發展的一個時期，與此同時，三大區之間的文化交流在這一時期也最為頻繁。考古文化個性的充分發展已如前述，即以彩陶、尖底瓶為主要文化特徵的中原區、以鼎、豆、壺為主要文化特徵的東南區及與筒形罐為主要文化特徵的東北區，涇渭分明，而其間的文化交匯，以南北之間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交匯，東西之間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的交匯，最具代表性，史前時期考古文化間雙向交匯的這兩件大事，對各區域文明起源的作用及此後文化特徵的發展和文化傳統的延續，影響也最大（圖一四）（註二一）。

令人關注的是，玉器在這一文明起源進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有關紅山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討論，就是從考證該文化玉器開始的（註二二）。此後的深入研究表明，紅山文化具有「唯玉為葬」習俗，這是唯玉為禮的表現，是玉器為最早的禮器的典型實證（註二三）。東北其他地區雖發展水平不如紅山文化，但像黑龍江省小南山高聳於山頂上只出玉器群的墓葬，也被認為是與文明起源有關的因素。可知，玉器已成為紅山文化以至整個東北史前文化向文明社會邁進的一個重要標誌。如此，則對玉情有獨尊的紅山人必然對玉材的來源格外重視。紅山文化的玉材之路，當有一段精彩的歷史事件，這是研究紅山文化玉材與岫岩玉關係時要特別予以考慮

的。

考古發現還證明，在文化交流中，玉器的傳播最為敏感。

陶器作為劃分考古文化和考古文化區的標準器是不容質疑的，但玉器作為一種主要反映思想意識的非實用器，又有高於其他文化因素包括陶器的地位，這集中表現為玉器在文化交流中的敏感性。從各大區發現的玉器分析，玉器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表現出的傳播與影響，往往要大於包括陶器在內的其他文化因素。就東北文化區而言，玉器的共性也要大於陶器，如作為紅山文化玉器重要特徵的方圓型璧以及二聯璧和三聯璧，也往往是東北其他地區史前文化遺址中玉器的主要類型和特點。在大區間交流中玉器也扮演著主要角色。良渚文化玉器向長江中上游和中原以至陝北的傳播最能說明這一點（註三四）。還可舉東南沿海區與東北區之間的關係為例：在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中，出有具紅山文化以及東北文化特徵的多聯璧；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的史前玉器，都以玉牙璧、玉錐形器為主要類型。一般以為，遼東半島的玉器，與陶器一樣，都是受到山東史前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但長海縣廣鹿島吳家村遺址採集的玉牙璧，時代較迄今所知山東史前文化所出玉牙璧為早，郭家村遺址下層還出有陶牙璧，所以也有的學者以為，並不排除玉牙璧由遼東半島向山東半島傳播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吳家村玉牙璧邊薄似刃的作風，與山東半島璧面平直的玉牙璧有所不同，卻具紅

山文化以至東北史前文化玉璧的共同地域特點，這至少說明，這類玉牙璧是在當地製作的（圖一五）。岡村秀典並以為，山東史前玉器的玉料產地，就可能與其有密切文化聯繫的遼東地區有關，或可能就來自於岫岩玉礦。如是，則在遼東半島與膠東半島的文化交流中，玉器的交流範圍就要大於陶器，因為遼東半島史前

文化對膠東半島的影響，表現在陶器方面，只限於山東半島北部的廟島群島，而玉器的交流已則深入到山東半島南部（註三五）。
以上對包括玉器在內的地域共同性的比較分析，以及區間文化交流在其中的作用，意在說明，三大考古文化區的劃分，與古代玉材的三大產地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當非偶然，它們是各大區內諸考古文化和區間頻繁交流、不斷進行文化組合與重組的結果，同時也暗示出玉材作為崇玉人群體現思維觀念載體的唯一資源，其產地所在在史前人類文化共同體形成和頻繁交流過程中、特別是在以玉作為文明起源標誌的史前人類群體形成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由此也可預知，將紅山文化等史前文化的玉產地與中國玉文化以及文明起源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將把玉材產地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層次。這應是今後玉器研究的新課題。

註：

- 一、《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 二、聞廣：《古玉研究》，《地質研究》一九九〇年。
- 三、王時麒：《岫岩軟玉與紅山文化》，錢憲和客座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集》（二）第五一五～五二九頁，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系，二〇〇一年；崔文元等：《岫岩及和田玉軟玉（透閃石玉）的研究》，在二〇〇二年鞍山玉器研討會上的發言。
- 四、吳小紅等：《肖家屋脊遺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玉料產地初步分析》，錢憲和客座主編《海峽兩岸



圖一五 吳家村遺址出土玉牙璧

- 古玉學會議論文專集》(11) 第五五七~五六二頁，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系，二〇〇一年；鄒天人：〈遼寧岫玉和岫岩玉的產地特徵及古玉溯源〉，二〇〇二年鞍山玉器研討會論文。
- 五、劉觀民：〈五千年前環渤海灣考古學文化區系關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環渤海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石家莊，一九九二) 五〇~五三頁，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六、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編者：《大南溝—後紅山文化墓地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七、張喜榮、唐凱：〈對小孤山、將軍山史前岫玉文化探討〉，二〇〇二年鞍山玉器研討會上的發言。
- 八、周曉晶：〈遼東半島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 九、許玉林、楊永芳：〈遼寧岫岩北溝西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二年五期。
- 十、許玉林、付仁義、王傳普：〈遼寧東溝縣後窪遺址發掘概要〉，《文物》一九八九年十一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館：《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遺存》第七、一二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十一、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故宮博物館：〈瀋陽新樂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二期。
- 十二、遼寧省博物館、旅順博物館：〈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貝丘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一年一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大連市北吳屯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九四年三期。
- 十三、同註十一：遼寧省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四期；岡村秀典：〈遼東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錢憲和客座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集》(11) 第三二九頁，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系，二〇〇一年。
- 十四、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旅順博物館：〈遼寧省瓦房店市長興島三堂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一九九二年二期。
- 十五、澄田正一、秋山進午、岡村秀典：〈一九四一年四平山積石墓的調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四》第三八~四二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岡村秀典：〈遼東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錢憲和客座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集》(11) 第三三三~三三四頁，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系，二〇〇一年。
- 十六、丹東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隊：〈丹東市東溝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一九八四年一期；遼寧省博物館：〈遼寧東溝大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一九八六年四期；許玉林、金石柱：〈遼寧丹東地區鴨綠江右岸及其支流的新石器時代遺存〉，《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期。
- 十七、同註十四。
- 十八、楊伯達：〈珣玗琕考〉，《北方文物》二〇〇二年第二期；又，聞廣在有關考古報告發表後，曾對遼東半島史前玉器作過取樣鑒定，共取樣三十三件，結果是：透閃石軟玉二十九件，絹雲母岩玉一件。
- 十九、方殿春：〈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初步發掘與分析〉，《遼海文物學刊》一九九一年一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阜新縣查海遺址一九八七~一九九〇年三次發掘〉，《文物》一九九四年十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敖漢旗興隆窪聚落遺址一九九二年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七年一期；劉國祥：〈興隆溝聚落遺址：八〇〇〇年前精美玉器／五〇〇〇年前裸女陶塑〉，《文物天地》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 二十、劉晉祥：〈翁牛特旗小善德溝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一九八九》第一三〇~一三二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二一、敖漢旗博物館：〈敖漢旗南臺地趙寶溝文化遺址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
- 二二、見李恭篤、高美璇：〈紅山文化玉雕藝術初析〉，《史前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 二三、趙寶福：〈吉林省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關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鄧聰主編：《東亞玉器·一》第一六四~一七〇頁，一九九八年；孫長慶、殷德明、干志耿：〈黑龍江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兼論黑龍江古代文明的起源〉，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四》第一〇四~一三四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二四、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饒河縣文物管理所：〈黑龍江饒河縣小南山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一九九六年二期；殷德明、干志耿、孫長慶：〈饒河小南山出土玉器研究〉，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第九一~九九頁，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二五、郭大順：〈玉器的起源與漁獵文化〉，《北方文物》一九九六年四期；煙宏明、北寺康史：〈日本國北海道地における舊石器時代及び繩紋時代前半の玉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鄧聰編《東亞玉器·二》第三二二~三二九頁，一九九八年。
- 二六、孫長慶、殷德明、干志耿：〈黑龍江新石器時代玉器概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鄧聰編《東亞玉器·一》第一二七頁，一九九八年。
- 二七、黃宣佩：〈略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一九八七年。
- 二八、鄧淑蘋：〈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一九九五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辦中國古玉研討會論
- 文，刊于《中華文化學會》一九九五年年刊。
- 二九、楊伯達〈珣玗琕考〉，《北方文物》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 三〇、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提要)〉，《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郭大順：〈文化交彙與中國早期國家〉，北京大學「迎接二十一世紀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一九九二年。
- 三一、郭大順：〈三大區交彙與中國文明起源〉，「溫故知新—面向中國考古學的未來」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十三期，二〇〇〇年八月。
- 三二、孫守道、郭大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文物》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 三三、郭大順：〈紅山文化的「唯玉為葬」與遼河文明起源特徵再認識〉，《文物》一九九八年第八期。
- 三四、郭大順：〈玉與陶—中國史前玉文化研究提出的新課題〉，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第九一~九九頁，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三五、岡村秀典(姜寶蓮譯)：〈中國史前時期玉器的生產與流通〉，《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佟偉華：〈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原始文化的交流〉，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第七八~九五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